



中国近代史论坛

FORUM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一辑

No.1

中国近代乡村 研究的 理论与实证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RURAL CHINA IN MODERN TIME

主 编 徐秀丽 黄正林
执行编辑 潘晓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 **现代史** 论坛
FORUM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一辑 *No.1*

中国近代乡村 研究的 理论与实证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RURAL CHINA IN MODERN TIME

主 编 徐秀丽 黄正林

执行编辑 潘晓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徐秀丽,黄正林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97 - 3845 - 0

I. ①中… II. ①徐… ②黄… III. ①农村经济发展 - 中国 - 近代 - 文集 IV. ①F329.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268 号

中国近代史论坛第一辑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

主 编 / 徐秀丽 黄正林

执行编辑 / 潘晓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晨光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45 - 0

定 价 / 78.00 元

印 张 / 28.5

字 数 / 47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以开放的心态研究经济史（代序）

徐秀丽

首先感谢各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并提交高品质的学术论文。在一个学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浮躁的时代，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经济史，尤其是研究不属显学而又相对枯燥的乡村经济史，没有学术兴趣和学术精神是难以坚持的。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同类相聚”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对话的会议，收到邀请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给予积极的回应，这让我们对中国学术的现状和未来产生乐观和信心。

学术会议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对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增进学者之间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而比较小型的专题学术会议，则有助于讨论深层次的学术问题，有可能解开制约某个研究领域发展的症结，在关键性问题上取得共识或受到相互启发。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众多，而以主题广泛的大中型会议为主，《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所属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有责任在专题研究方面起到力所能及的推动作用。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也经过与一些学者的商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决定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对近代史研究中学术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的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的邀请对象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长期工作、发表过重要学术成果并在一定程度卷入争论的代表性学者，规模在30人左右，以期真正对相关研究有所推动。

今天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设想中的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会议的设想，即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会议之所以冠以“理论与实证”的名称，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推进，不但要进行更加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要运用更加多元有效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加强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吴承明先生

一再说：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他本人是学经济出身的，但他反复强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一方面，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不舍弃一些条件就无法抽象为理论，而舍弃就会离开历史实际。吴先生认为，经济史属于历史学，而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实证研究是治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我认为，正因为吴先生是从经济学出身研究经济史，他对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和问题有着高度的警醒，这表明了一位大学问家的谦虚和清醒，这也是一个学者能够站到高处的原因和结果。

然而，对于从历史学出身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是否需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思考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有海外学者说：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但中国的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这是指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缺少理论指引和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当然有过甚其言的地方，因为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史研究都需要借助理论工具。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说：在史学研究中是否运用理论，取决于研究者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但是，不能否认，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有学者认为其造成的损害一样多），尤其是当考察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长期演变及其规律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慧眼，难免雾里看花，甚至连问题意识也难以形成。经济学是对经济史影响最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农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对经济史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众多的社会科学理论，将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我相信，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美国学者施坚雅解释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虽然许多学者对其模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和补充，但是他的理论依然具有难以企及的解释力，而这正是理论的力量和魅力之所在。

前辈历史学家有云，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历史事实与我们的见解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游戏”，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最清楚地知道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正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每一次问答和游

戏，都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对于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学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任何学术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同时，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多元选择并不会影响相互讨论的乐趣和益处，毋宁说，正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才使得彼此切磋论辩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毕生奉献给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如同任何其他学问一样，心态开放、多元共存是历史学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如果这次会议能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启发，如果大家能够从中获得智力上的乐趣，对会议组织者而言，就算大功告成了。

谢谢大家！

夏明方

（本文原为会议开幕式发言）

内容提要 本文系基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作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综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个体经济的变化做出全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关键词 斯密型动力 社会分工 技术分工 “没有分工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被编成一种叫做GDP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

目 录

以开放的心态研究经济史（代序） 徐秀丽 / 1

真假亚当·斯密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 夏明方 / 1

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 任 放 / 38

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

——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 王大任 / 53

走向产权的在地化解释

——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研究再评述 张佩国 / 74

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

——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胡英泽 / 105

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分化与阶级分化

——毛泽东《寻乌调查》研究 曹树基 / 135

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黄道炫 / 163

分散与不均：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乡村的

土地分配关系 李金铮 / 177

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

——以太和县为个案 窦祥铭 慈鸿飞 / 200

永佃制下土地买卖的演变及其影响

——以皖南徽州地区为例 刘克祥 / 219

1929—1948 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

及其原因分析 张 丽 / 259

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佃农

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1946—1948） 李德英 / 272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

——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王先明 / 300

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 马俊亚 / 329

参加土改知识分子眼中之地主形象 张会芳 / 351

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 黄正林 / 370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的关系

——基于“大跃进”后贵州农村集市贸易的分析 李飞龙 / 405

求同存异 推陈出新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学术研讨会”综述

..... 张 艳 / 422

编后记 / 443

CONTENTS

To Study Economic History with an Open Attitude (Preface)	Xu Xiuli / 1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Village Economies through the Lens of "Market without Division of Labor"	Xia Mingfang / 1
Community Paradigm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Village Market, Power and Resource Drain: Revisi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Modern North-Eastern China Villages	Ren Fang / 38 Wang Daren / 53
Towards the Localized Explan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Reexamining the Studies of Land Ownership in Rural Areas of Modern China	Zhang Peiguo / 74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Land Ownership based on Fish-Scale Inventory sinc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Hu Yingze / 105
Land Ownership Polarization and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Study on the Survey of Xunwu by Mao Zedong	Cao Shuji / 135
Land Inventory Movement: Theories, Strategies and Reality	Huang Daoxuan / 163
Fragmentation and Unevenness of the Land Allocations in Modern North China Plain: A Case Study on Dingxian County in Central Hebei	Li Jinzheng / 177

Evolution of Land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Taihe County *Dou Xiangming* *Ci Hongfei* / 200

Permanent Tenancy and the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Land Transactions:

A Case Study on Huizhou Area in South Anhui *Liu Kexiang* / 219

Changes of Occupancy Rate and Rate of Land Rents in the Villages

of Wuxi from 1929 to 1948 and Its Causes *Zhang Li* / 259

Cottiers, Landlords and the Stat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Policies for Cottiers through Analysis on Cottiers-Landlords

Disputes in Chengdu Plain (1946—1948) *Li Deying* / 272

Social Mobility of Rich Peasants: Analysis on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1930s—1940s *Wang Xianming* / 300

The Right of the First Night in Modern Su-Lu Area: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in Personality *Ma Junya* / 329

Images of Landlords in the Eyes of Intellectuals Partaking in the Land Reform

..... *Zhang Huifang* / 351

Agricultural Loans and the Revival of Rural Economy

in Gansu (1935—1945) *Huang Zhenglin* / 370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 Power,

Grassroots Market and Peasants' Lives—Analysis based on the

Rural Market in Guizhou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i Feilong* / 405

Seeking Common Grounds and Pushing for Innovation: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Villages” *Zhang Yan* / 422

真假亚当·斯密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 乡村经济的变迁

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聚集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作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关键词 斯密型动力 社会分工 技术分工 “没有分工的市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浓缩成一种叫做 GDP 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

是“经济人”，一个被认为可适用于任何时代因而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的抽象个体。其二是将经济问题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加以考察，结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倾向，如城市与乡村割裂、经济与社会分离、人与自然互不相关、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其三则是此类研究无不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即使在所谓的乡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导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四是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种对立共生的辩证分析态度，过往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极化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总摆脱不了“断尾巴蜻蜓”之嫌。尽管我们往往在现实发展之中获得灵感，对过去展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释工作，但是很少自觉地把从历史研究中获得智慧用来观照或反思当下，也很少把当下的现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以至于——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即城乡分离运动或美其名曰“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或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长期缄口不言；或听凭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肆意鼓吹。无论如何，这都不利于对中国乡村经济之历史的认识，也无助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乡村经济的走向与命运。

早就应该到扭转这一倾向的时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国度，一切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可是，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城市化、非农化的潮流，我们更应该从反面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农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终结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否将因此面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走出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捡起一个极具洞见却备受冷落的概念，即“没有分工的市场”，也就是从农工结合的角度，或许会对近世中国数百年乡村经济的历史变迁贡献一点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暂且停留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鸣之中，希望借助对这些争鸣的梳理，寻找可能的线索。

一 “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

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笔者捏造，是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据吴先生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理解，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①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这种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也在逐步成长，近代以后，其作用愈益显著，而前者作为小商品市场，在吴先生看来，是必须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场所取代的。不少中国学者因之主张将这样的市场作为虚假市场而踢出研究视野之外。^②近年来，吴先生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越来越强调基于社会分工的斯密型市场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放弃“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其对历史过程的斯密式解释，实际上又将此前所谓的“小商品市场”或“虚假市场”转换成“斯密型市场”了，客观上也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

这一变化与近十余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相辅相成。后者是在吴先生曾经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或后来的近代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反过来又对前者乃至中国大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观点有多少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在于隐身其后的新的规范认识或理论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

① 吴承明：《市场理论与市场史》，《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86，第211—222页。

② 参见夏明方《“斯密型动力”、过密化理论与生态变迁——多元视野下的旧中国农村商品化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第150—165页。

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① 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② 林刚则依据对斯密原著的阅读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梳理,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不当运用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辨析。^③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④

① [英] 迈克尔·佩罗曼著《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9页。

②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22页。

③ 林刚:《关于斯密型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1页。

④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45页。

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改善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和出现了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亦即“专业化生产单位和分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是单位本身内部工作任务的专业化（技术分工的发展）”。^① 因此，加州学派将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济演进的动力一概称之为“斯密型动力”，可谓大谬不然。

然而，发现其中奥妙的阿里吉，居然还是将中国过去已经发生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叫做“斯密道路”，并将“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发明权归于加州学派，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阿里吉的“澄清”，使这一潭理论之水变得更加浑浊。只有再一次返回这些经典作家的原著，并结合其后众多理论家，包括阿里吉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才可以大致重塑斯密形象。不过，首先要做的，还是探究一下阿里吉是怎样重演了一幕“龙凤掉包”的学术大戏。

阿里吉对盛行学界的假斯密现象的发难，是从加州学派的对立面——同属加州大学的黄宗智与布伦纳开始的，他认为后者“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分工抬到了作为经济无限发展的条件的高度，这就把斯密对这两个现象的负面看法本末倒置了”。^② 这一批评指出了布—黄学派的一个重要局限，却构成了对布—黄学派的最大误解。黄的早期研究确实是将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看作是英国截然不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并把它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途，一度为中国如何摆脱“过密化陷阱”、最终走向与欧美相似的道路而费心尽力，因而多少也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念，但是其目的在于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商品化等于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规范信念，进而勾勒出一幅市场发育多元化的现实图景，而且至少就其对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所做的观察来说，黄并未将阿里吉最初发现的亚当·斯密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不变的动力。此处不应模糊其理论中隐性的“价值评判”与其对具体的历史进程所做的“事实裁定”之间的界限。倒是阿里吉本人，其真正意图乃在于反复强调东亚“勤劳革命”（亦译作“勤勉革命”）在中国经济演进中的作用，极力赞同日本学者杉原薰所提出的“东亚道路”。如此一来，

①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 47 页。

②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 64 页。

又势必与其“发现”的斯密模式或社会分工模式背道而驰。于是，经过一番理论改造，阿里吉便将杉原薰模式径直包装成后者，认为他“对东亚道路典型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的优势所给予的积极评价完全是斯密式的，其中主要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圆满完成多种任务的劳动力；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① 由此发现阿里吉心目中的另一个亚当·斯密：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亦非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即“劳动分工”）的理论家与鼓吹者，所有这些，都是后世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误解；相反，这一位斯密，更强调“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强调“竞争与分工是现存社会框架内经济扩张的互动条件”，以及“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② 根据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论化的这两条道路，一是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一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通道。它们既非加州学派之“欧亚相似论”所鼓吹的同一条道路，也不是布—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潜力；相反，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且都会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实际上，在阿里吉看来，“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峰”，而欧洲道路则是一种“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径，故此他“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给欧洲政治家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国的发展过程转向‘自然的’道路”。今日东亚的复兴，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关于市场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③

若稍加辨析，便可看出，阿里吉在这里实际上采用的是黄宗智的逻辑，即把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区别开来，认为两者之间，至少就中

①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4页。

②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34页。

③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51、61—64页。

国而言，存在着根本差异^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② 他也承认，“杉原薰关于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增长’”，但是由于黄的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概念，没有像杉原那样考虑到“劳动密集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的可能性”，忽略其“进化”和“发展”的趋向，故而被看成是“没有依据的”。^③ 因之，阿里吉与布—黄学派的真正分歧，是对勤劳革命——一种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不同评价，一个看到的是其中消极的一面，一个却突出其活力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阿里吉又将黄宗智的逻辑来了一个倒转，在黄宗智那里属于斯密逻辑（也包括马克思）的“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被仅仅称之为“熊彼特或马克思的发展”；在黄那里被视为反斯密的市场，即所谓“勤劳革命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则变成了“斯密本人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④ 而且这一发展类型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东亚或中国当代复兴的火车头。阿里吉似乎忘记了斯密从来没有对市场做出这样的区分。他所做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发现”真实的亚当·斯密，不如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这样的亚当·斯密，既是对既有理论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罔顾，同时背离了他本人对亚当·斯密的所谓重新“发现”。恰如其著作标题“亚当·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国固然到处都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个亚当·斯密与阿里吉所“发现”的真正的亚当·斯密，完全是两个模样。

二 “自然道路”与“反自然道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究其实，阿里吉也看到了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还指出

①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16页。尽管黄宗智与加州学派之间的争论似乎水火不容，但黄的这一判断基本上还是被后者所吸收了；区别在于双方对18世纪中国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不同，对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经济演变轨迹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黄的判断更具灵活性，加州学派则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截断了。奇怪的是，阿里吉在其行文中却将这一判断称为一种“新的认识”，并将其主要归功于加州学派。

②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页。

③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0—31页。

④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页。